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

A CRITICAL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IES

(1949—2009)

陶东风 和 磊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

A CRITICAL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IES

(1949—200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 (1949—2009) / 陶东风, 和磊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2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

ISBN 978 - 7 - 5004 - 8488 - 2

I. ①当… II. ①陶…②和… III. ①文艺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2543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郭蕾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64073836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 - 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46	插 页	3
字 数	773 千字		
定 价	10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伟光

副主任 李 扬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国刚	王 巍	尹韵公	厉 声	张宇燕
张顺洪	李汉林	李 平	李 周	李向阳	李 林
李 薇	李培林	步 平	吴恩远	陈众议	陈泽宪
陆建德	房 宁	金 碚	杨 光	卓新平	周 弘
郝时远	郑秉文	赵剑英	晋保平	曹广顺	黄 平
朝戈金	程恩富	谢地坤	裴长洪	蔡 昉	潘家华

总策划 赵剑英

统 筹 曹宏举 王 浩 任 明

总 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变动之中，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和改革开放的攻坚期。这一切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目前面对三大有利条件：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素材。二是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实施，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营造了良好环境。

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响应这一号召，启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旨在努力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学术观点与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组织与管理创新、科研方法与手段创新、用人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实施创新工程的目的是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不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精品成果，多出政治方向正确、学术导向明确、科研成果突出的高层次人才，为人民服务，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明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实施创新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规律，完善学科建设机制，优化学科结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结构合理、优势突出、适应国家需要的学科布局。作为创新工程精品成果的展示平台，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报告的撰写，对于准确把握学科前沿发展状况、积极推进学科建设和创新来说，是一项兼具基础性和长远性的重要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伴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也处在形成和发展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不断拓展与深化，成就显著、举世瞩目。为了促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观念、方法和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更主动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扩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我们亟待梳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思想的发展轨迹，不断总结各学科积累的优秀成果，包括重大学术观点的提出及影响、重要学术流派的形成与演变、重要学术著作与文献的撰著与出版、重要学术代表人物的涌现与成长等。为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编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大型连续出版丛书，既是学术界和出版界的盛事，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分为两个子系列：《年度综述》和《前沿报告》。《年度综述》按一级学科分类，每年度发布，《前沿报告》每三年发布，并都编撰成书陆续出版。学科《年度综述》内容包括本年度国内外学科发展最新动态、重要理论观点与方法、热点问题，代表性学者及代表作；学科《前沿报告》内容包括学科发展的总体状况，三年来国内外学科前沿动态、最新理论观点与方法、重大理论创新与热点问题，国内外学科前沿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每部学科发展报告都应当是反映当代重要学科学术思想发展、演变脉络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性成果；都应当是作者长期以来对学科跟踪研究的辛勤结晶；都应当反映学科最新发展动态，准确把握学科前沿，引领学科发展方向。我们相信，该出版工程的实施必将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该系列丛书也将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领域重要的史料文献和教学材料，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学事业以及人才培养作出重要贡献。

目 录

导论 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公共性问题	(1)
一 文学公共性的规范特征	(1)
二 文学的公共性与自主性	(7)
三 文学的公共性与私人性	(10)
四 文学的公共性与政治性	(13)
第一章 文坛秩序的建构与文艺学新话语的初步确立	(20)
一 《讲话》与社会主义文艺学新方向的确立	(20)
二 第一次文代会与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	(32)
第二章 文艺界大批判:初露锋芒的文学批评新话语	(47)
一 电影《武训传》批判与文艺界整风运动	(47)
二 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运动	(54)
三 《红楼梦》研究批判	(59)
四 胡风文艺思想批判	(69)
五 “反右”运动中的文艺批判	(83)
第三章 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两结合”	(93)
一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制度化	(93)
二 关于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	(99)
三 “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与讨论	(116)

第四章 新民歌运动与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	(128)
一 新民歌运动概述	(128)
二 重建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	(130)
三 民族风格与大众化	(133)
四 五四新诗传统的评价与重塑	(137)
五 重新评价古典诗歌	(145)
六 艺术形式的阶级性	(148)
七 思想改造与诗人的工人阶级化	(152)
结束语	(160)
第五章 “双百”方针的提出与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	(162)
一 “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背景	(162)
二 三个会议与《文艺八条》	(168)
第六章 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	(176)
一 对阿垅“艺术即政治”论的批判	(176)
二 关于为政策服务与“赶任务”	(178)
三 对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现象的批评	(182)
第七章 关于人物形象问题的讨论	(188)
一 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	(188)
二 关于“正面人物”和“新英雄人物”	(192)
三 关于“中间人物”的讨论	(204)
四 “三突出”和“高大全”	(207)
五 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讨论	(210)
第八章 关于题材问题的讨论	(216)
一 “题材差别”论和“题材决定”论	(216)
二 反“题材决定”论	(218)
三 新时期关于题材的讨论	(223)

第九章 关于写真实和真实性问题的讨论	(227)
一 新中国成立初关于真实性问题的讨论	(227)
二 50 年代中期关于“写真实”的讨论	(229)
三 新时期写真实问题的讨论	(236)
第十章 文艺学教材建设	(242)
一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文艺学教材的历史沿革	(242)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学教学大讨论	(245)
三 苏联文艺学主导下的文艺学教材编写	(252)
四 周扬与文艺学统编教材	(262)
第十一章 “文革”中的文艺学	(268)
一 极“左”思潮的兴盛与部队文艺创作座谈会	(268)
二 “文艺黑线专政”论	(274)
三 “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创作原则	(278)
第十二章 拨乱反正与第四次文代会	(280)
一 拨乱反正与为文艺正名	(280)
二 历史性的转折:第四次文代会	(282)
三 “二为”方向的提出与党的文艺政策的新调整	(289)
第十三章 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讨论	(294)
一 20 世纪 50 年代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	(294)
二 新时期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论争	(302)
第十四章 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	(322)
一 “文革”前关于典型的讨论	(322)
二 新时期典型问题的论争	(333)
三 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	(343)
第十五章 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	(352)
一 “文革”前第一次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	(352)

二 新时期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	(358)
第十六章 新方法论与文艺学的科学主义思潮	(368)
一 新方法论的引入与文艺学观念的革新	(368)
二 自然科学方法论在文艺学中的应用	(375)
三 关于文艺学科学主义思潮的论争	(382)
第十七章 向内转与文学主体性的建构	(387)
一 文学主体性的论争	(387)
二 “向内转”的论争与文艺心理学的兴起	(399)
第十八章 形式/语言/符号本体论文艺学	(421)
一 英美新批评的引入与本土化实践	(422)
二 俄国形式主义的引入与本土化实践	(425)
三 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引入与本土化实践	(429)
四 文体学的理论与实践	(442)
第十九章 文学史新观念的建构	(453)
一 关于“重写文学史”	(453)
二 对文学史学科的整体反思与理论建构	(470)
三 文学史学的理论建构	(477)
第二十章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中国文艺学的本土化焦虑	(492)
一 文论失语症的提出及其多重含义	(493)
二 从文论失语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499)
三 古代文论可否转换及如何转换	(502)
四 文论重建与文化复兴	(513)
第二十一章 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艺学	(519)
一 市场经济与文学观念的嬗变	(519)
二 “人文精神”大讨论	(531)
三 关于大众文化的讨论	(544)

四 大众文化语境下关于“纯文学”的讨论	(558)
第二十二章 后-主义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艺学	(569)
一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语境	(569)
二 后现代主义对文艺学的影响	(579)
三 后殖民主义(批评)及其对启蒙文学的反思	(579)
四 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终结论的争论	(591)
第二十三章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	(609)
一 日常生活审美化:一种消费文化现象	(609)
二 “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在国内的出现	(613)
三 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	(619)
四 反思:作为话题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627)
五 “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中几个核心问题的思考	(629)
第二十四章 文化的转向	(645)
一 文化诗学转向	(645)
二 文化研究(批评)的出现语境	(647)
三 关于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653)
四 文化批评与文学的自主性问题	(661)
五 关于文化批评与外在研究	(664)
第二十五章 新时期文艺学的历史反思与教材建设	(671)
一 百年文艺学的历史估价与问题诊断	(672)
二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文学理论教材建设	(677)
三 后现代语境中的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	(691)
四 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	(699)
第二十六章 当代文艺学关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论争	(707)
一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形成和发展	(708)
二 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批评意见	(714)
三 批评的批评	(722)

导 论

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公共性问题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问题，最近正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2008年8月底在新疆召开的“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公共性”学术讨论会上，不少学者对这个会议议题本身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文学回归自身的时代，突出所谓公共性问题是合不合时宜的，是倒退。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这样的看法是并不奇怪的。在具有“文革”记忆的几代中国文学工作者心目中，文学的“公共性”这个提法不仅容易引发误解，也容易勾起很多人不愉快的记忆。他们从这个词会想到曾经有过的文学艺术领域硝烟弥漫的斗争，各种借学术名义进行的群体运动、政治运动，联想到“反右”、“大跃进”时期的民歌，“文革”时期的样板戏，等等。似乎这些文学和文学运动最有所谓的“公共性”。在这样的理解视域中，文学的公共性与文学的自主性、审美性、私人性等就自然而然地对立起来了，似乎倡导文学的公共性就会牺牲掉文学的自主性、审美性、个体性和私人性。

对此，我们既表示理解也深感悲哀。它只能说明“公”、“公共”（以及相关的“政治”、“集体”等）这些术语在我国已经被败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我们今天还在承受其灾难性的后果。这更说明重新理解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文学公共领域等概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样必要和迫切的是交代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重新提出公共性这个命题的。

由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问题是当代文艺学的总体性、贯穿性的问题，我们准备把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作为全书的导言。

一 文学公共性的规范特征

谈到文学公共领域，当然不能不提及哈贝马斯（J. Habermas），因为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历史描述的术语,哈贝马斯用它特指18世纪西欧(主要是英、法、德三国)出现的历史现象。他在论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建构时认为,文学公共领域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前身和雏形。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不同于此前中世纪封建社会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它是在近代资产阶级公民社会成熟并获得独立(独立于甚至对抗政治国家)的条件下出现的。哈贝马斯把代表型公共领域的特点概括为:“‘王权’有高低之分,特权有大小之别,但不存在任何一种私法意义上的合法地位,能够确保私人进入公共领域。”^①缺乏自律的私人个体、缺乏民主原则和开放性、没有保障私人进入公共领域的法律制度,可以视作代表型公共领域及其所反映的宫廷文化政治的基本特点。所谓代表型公共领域,其实质不过是专制王权把代表自己特权的符号、仪式、物件拿出来公开展示亮相,让大家见识见识而已。相反,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由有主体性的、由法律保障的自律个体(私人)组成,他们从事的活动乃是对公共事务进行政治讨论,而讨论的方式则是理性而公开的批判。^②

这样一种具有政治功能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出现在文学界(当然,哈贝马斯的“文学”概念含义很广,不但包括了其他艺术,也包括了各类评论文体,甚至包括咖啡馆、酒吧、沙龙等谈论文学的场所),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最初是围绕着文学阅读公众形成的。在培养资产阶级公众的主体性、批判意识和理性论辩能力方面,文学公共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为这些公众介入政治讨论打下了基础。因此,文学公共领域本身虽不等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公共领域,但是却为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准备了具有批判性和自律性的公众。哈贝马斯说:“犹(原文如此——引者注)在公共权力机关的公共性引起私人政治批判的争议,最终完全被取消之前,在它的保护之下,一种非政治形式的公共领域——作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前身的文学公共领域已经形成。它是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这种公开批判基本上还集中在自己内部——这是一个私人对新的私人性的天生经验的自我启蒙过程。”^③这样,文学公共领域就成为由宫廷代表型公共领域过渡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

①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② 同上书,第32页。

③ 同上书,第34页。

桥梁：城市“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中心；在与‘宫廷’的文化政治的对立之中，城市里最突出的是一种文学公共领域，其机制体现为咖啡馆、沙龙以及宴会等。在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相遇过程中，那种充满人文色彩的贵族社交遗产通过很快就会发展成为公开批评的愉快交谈而成为没落的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①

限于篇幅，我们不准备详细介绍哈贝马斯对文学公共领域概念的历史梳理，就本导言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哈贝马斯赋予文学公共领域的规范内涵。这种规范内涵可以大致归纳如下：

首先，文学公共领域必须有文学公众的广泛参与并就文学以及其他重大的社会文化议题进行公开和理性的讨论。文学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必须具备起码的理性自律，本着平等、自主、独立之精神，就文学以及其他相关的政治文化问题进行积极的商谈、对话和沟通。这一点意味着文学公共领域是一个主体间理性的交往—对话领域。

其次，文学公共领域发生和存在的前提是文学活动的自主性，即文学领域与国家权力领域的相对分离，也就是说，独立于国家权力领域的、非官方的自主文学场域（包括文学市场、文学机构、文学游戏规则）等的发生与发育，是文学公共领域得以出现的前提，而这种自主性又依赖于国家和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相对分离，亦即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市民社会的存在。哈贝马斯曾经论证：“‘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②这个论述无疑也适合于文学公共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公共领域同样是现代性的建构。

这一点需要得到特别强调，因为它在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关系中解释了文学公共领域的“自主性”的社会条件，也体现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独特魅力。众所周知，“公共领域”概念在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发展中被赋予了诸多含义，也有诸多不同的解释路径。其中比较重要和普遍的解释路径有两个：一个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路径（liberal economical approach），它在国家—社会的二元框架中划分“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相当于国家行政管理领域，“私人领域”相当于市民社会；另

①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1页。

一个是共和主义路径 (republican approach), 它是从政治共同体和公民身份的角度界定“公共领域”的, 认为公共领域是公民积极参与的政治实践领域 (这种公共领域理论起源于古希腊, 在阿伦特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①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则和它们都有联系但又都不完全相同。他认为, 公共领域是介乎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调节地带, 一方面, 公共领域是由私人领域中具有主体性的自律私人组成的; 另一方面, 这些私人又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批判性地监督国家公共权力的使用。既独立于国家权力又批判性地参与其中。独立是参与的前提。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的建构是现代性的一个伟大成果, 它为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 为文学的自主性提供了社会基础。没有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力的社会文化领域, 也就是哈贝马斯说的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 文学活动就只能处在国家权力的控制下, 就不可能获得自主性, 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公共领域。正因为这样, 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地把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公共性笼统理解为文学的政治性, 好像任何公开化的、群众性的文学运动或任何以所谓“重大政治事件”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都是文学公共性的体现。

再次, 文学公共领域作为独立于国家权力领域的对话交往空间, 必然充满了多元和差异。对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理论发生过深刻影响的阿伦特曾经指出, 公共性的重要特点是差异性 (distinctness) 和共在性 (togetherness) 的统一。所谓“共在性”, 是指不同的个体人共同存在于同一个世界; 所谓“差异性”, 是说共在于这个世界的个体人是千差万别的。人们并不需要完全变得千篇一律 (包括看待世界的视角、立场等) 才能共处于公共世界; 相反, 对于差异性的消除必然导致公共世界的单一化、极权化, 亦即公共世界的消亡。公共世界的非极权化恰恰需要参与这个世界的人操持其观察视角和立场的多元性、复数性。同时在场而又保持行动者个体的多元性和差异性, 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特点。公共领域中每个个体的视点都没有一个共同的公度, 阿伦特说: “公共领域的实在性要取决于共同世界借以呈现自身的无数视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 而对于这些视点和方面, 人们是不可能设计出一套共同

^① Jeff Weintraub,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in *Public and Private in Thought and Practice: Perspectives on a Grand Dichotomy*, ed by Jeff Weintraub and Krishan Kuma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 7.

的测量方法或评判标准的。”^①之所以说各个个体看待世界的视点和角度具有不可化约的多元性，是因为尽管公共世界乃是公众会聚之所，但那些在场的诸多个体却总是处在各自不同的位置上。一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可能与另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完全相同，在非强制的情况下，他们观察世界的角度和立场也不可能没有差别。每个处在公共世界的人都希望自己被他人看见和听见，亦即被他人“见证”，而每个人都是站在不同的位置上来展示自己的卓越性，也是在不同的位置上来看和听他人言行的演示。“事物必须能够被许多人从不同的方面来看，与此同时又并不改变其同一性，这样才能使所有集合在它们周围的人明白，他们从绝对的多样性中看见了同一性，也只有这样，世俗的现实才能真实地、可靠地出新。”^②多样性是公共领域的最重要规定。在公共领域，各个人的视点和位置的不同并不妨碍各自的现实性，相反是其现实性的保证，因为现实性的保证不是人的“共同的本性”，而是不同的人（包括立场和其他方面的不同）对“同一个对象”的关注。

这个观点对文学的启示是十分丰富的。文学的公共性同样是共在性和差异性的统一。为了维护文学领域的这种多样性，文学公共领域并不需要一个本质化的、单一的文学观念（特别是自上而下通过国家确立并贯彻的不可质疑的文学观念）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它的参加者也不需要拥有相同的文学观念、文学立场才能共处于文学公共领域；相反，文学公共领域的健康存在和发展恰恰需要文学观念和立场的差异性和复数性。“当公共世界只能从一个方面被看见，只能从一个视点呈现出来时，它的末日也就到来了。”^③阿伦特的这句话当然也适合文学公共领域。复数性和差异性的消失标志着文学进入了极权主义状态，标志着文学的公共性的死亡。^④正因为这样，文学公共

① 参见阿伦特《人的境遇》（中国大陆一般翻译为《人的条件》），引文选自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8页。顺便指出，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阿伦特持有“呈现（表象）就是实在”的存在论立场，因此，在公共领域呈现和彰显的一切都具有实在性和客观性；同时，人也只有通过自己在公共领域的言行演示才能获得自己的实在性和客观性。

② 阿伦特：《人的境遇》，参见《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8—89页。

③ 同上书，第89页。

④ 或者说只是在可见性、展示性的意义上具有公开性。公共性概念的另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可见性，visibility，与隐秘性相对，凡是在公共场合公开展示的东西都具有这个意义上的公共性。理查德·桑内特指出：“‘公共’意味着向任何人的审视开放，而私人则意味着一个由家人和朋友构成的、受到遮蔽的生活区域。”参见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领域才需要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市民社会的依托,否则就难以抵抗来自一体化国家权力的干预。文学公共领域的存在与健康发展需要的不是统一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立场,而是对于文学这个公共交往空间的共同珍爱,而这种珍爱必须具体落实为对于每一个人的独特文学观念、文学立场的尊重,对于每一个人的文学权利——它是人的文化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尊重。

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几次高度政治化的错误文艺思潮,特别是极“左”的“文革”时期文学界情况,这点会看得更清楚。“文革”时期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由国家权力直接插手并统一制定不允许质疑的“文学理论”,这使得那个时期的文学理论界看起来很热闹,“争论”不断,而且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但这种“争论”和“讨论”几乎都是在复制自上而下贯彻的文学主张,其高度的统一性恰恰意味着文学公共领域的死亡。

最后,与差异性和复数性以及平等民主的对话交往原则相对应,文学公共领域的交往和沟通必须本着公正、理性的精神进行,所谓“理性的方式”,也就是“非权威”“非暴力”的方式。关于权威,阿伦特说:“权威的标志是要求服从着不加质疑的承认,无论是强迫还是说服都是不需要的。”^①文学公共领域的交往言谈的非权威性,指的是不存在一个控制着文学公共领域之交往对话的先存的、未加反思的、不能质疑的权威。这当然不是说文学公共领域根本不可能达成共识,而是说即使有共识,这种共识也是在自由、平等、民主的交谈基础上达成的,而不是由权威强加的。当文学公共领域的成员各自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和立场时,应该依据谁提出了“较佳论证”(better argument)来作为评价和认同的标准,舍此别无其他标准。

文学公共领域当然更须戒绝暴力,包括语言暴力。暴力是一种采取非言语、非说理的方式迫使对方服从的力量,因此,阿伦特认为暴力是政治无能的表现(因为政治是言说的艺术)。^②一个人只有在通过语言说理的方式不能赢得合法性的情况下才会诉诸暴力。文学公共领域的交往对话,特别是文学批评,是而且只能是一种理性的语言活动。既要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坚持自己的观点,又要尊重他人的言论自由,并抱有通过交往达成共识的真诚愿望。一般而言,在文学公共领域,特别是文学批评领域,使用物理暴力的

^① 阿伦特:《权力与暴力》,载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页。

^② 同上。